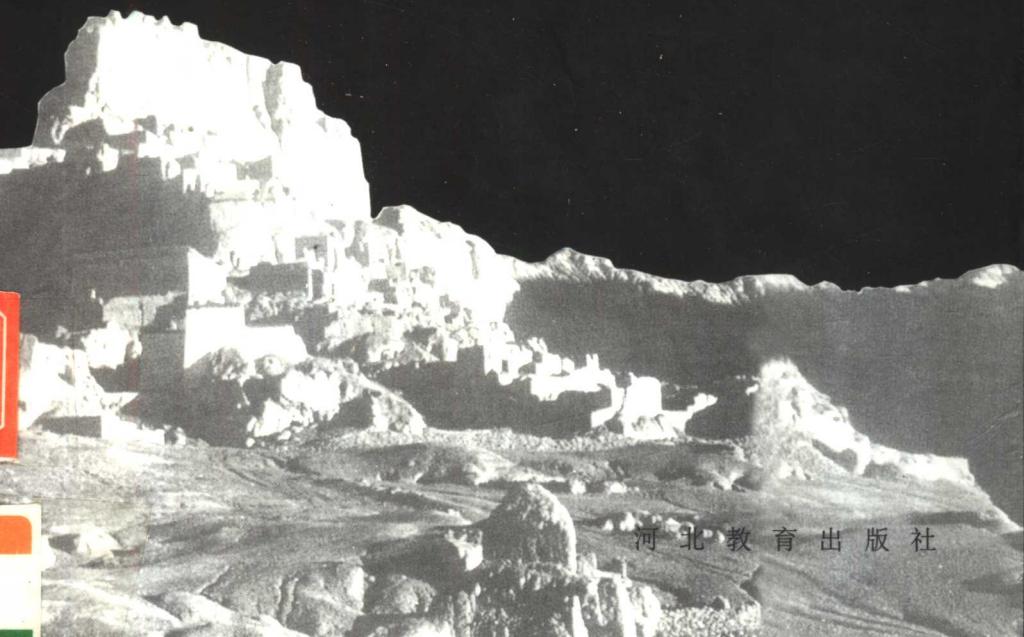


雪域精灵

从药汀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雪域精灵

从药汀 著

藏族女子在雪域高原上生活，她们的美丽令人神往。她们的勇敢、智慧、善良、纯真，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

藏族少女们在雪域高原上成长起来，她们的美丽、智慧、勇敢、纯真，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她们的美丽、智慧、勇敢、纯真，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

藏族少女们在雪域高原上成长起来，她们的美丽、智慧、勇敢、纯真，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她们的美丽、智慧、勇敢、纯真，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



河北教育出版社

雪域精灵

作 者 从药汀

责任编辑 周 蓓

装帧设计 徐占博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 编 050061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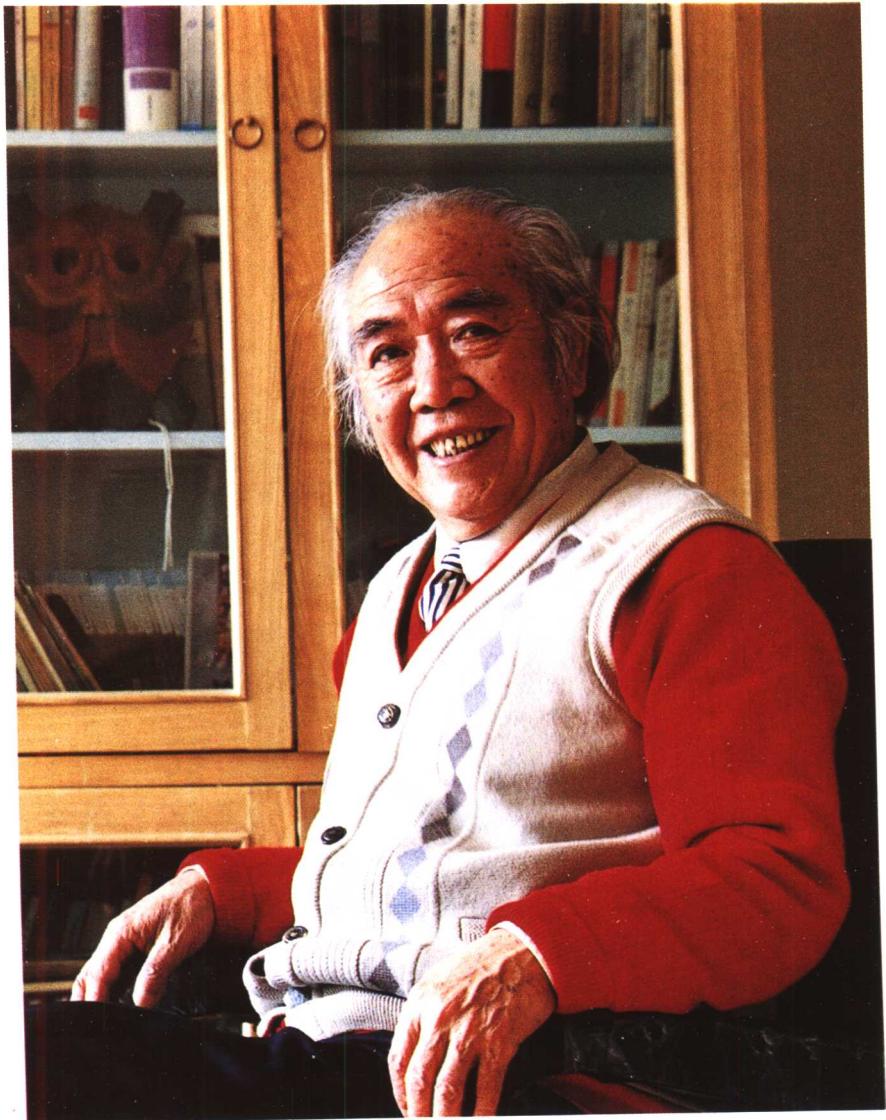
开 本 889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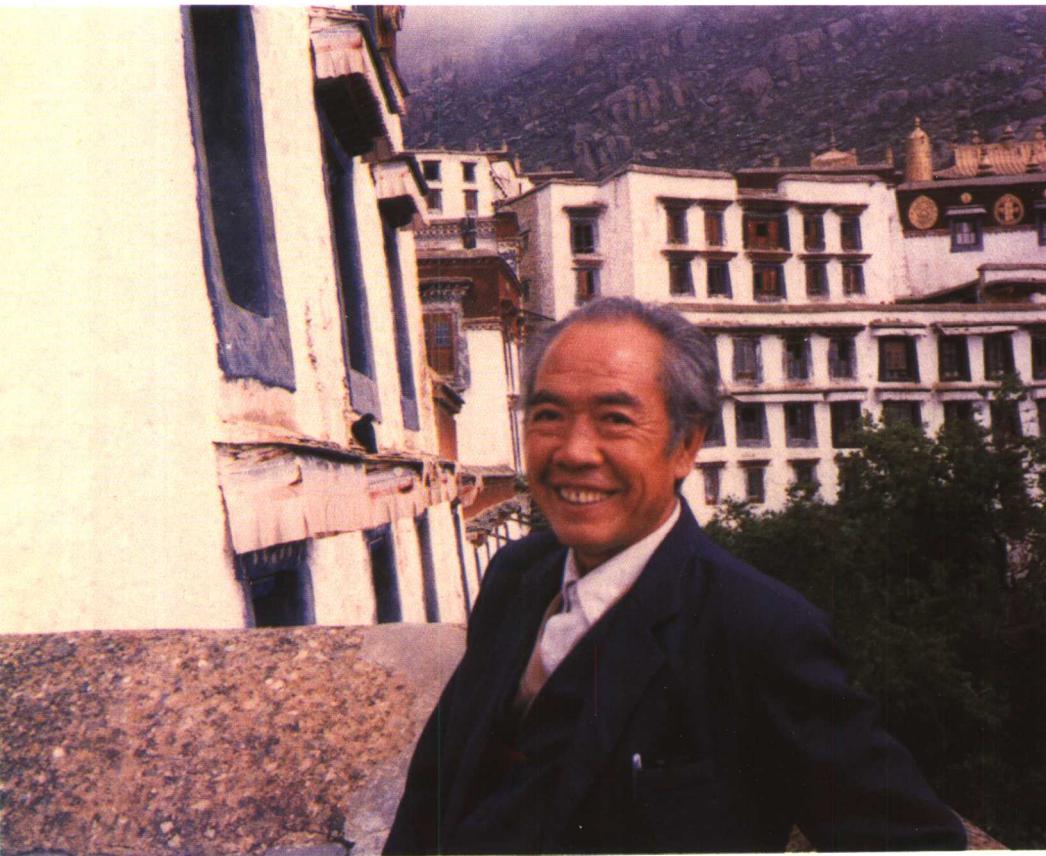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3038-X/I · 325

定 价 19.80 元



作者近影



作者于1987年造访拉萨哲蚌寺留影

再版序言 灵魂震颤的逻辑

周月亮

我有一种执拗的偏见：写不出哲学来的小说，不是好小说。任何成为经典的小说都运载着独特的人生哲学。我还曾倡导过“寓言读法”以解读小说这种最具有日常性文体的“微言大义”。五年前为从先生的小说写导读时，我曾乐观的预期：从先生这种诗化小说“若能普教后生，会带来小说的新变”。现在看来，物质时代的写作几乎从根本上告别了诗性，寻找意义、能经得起寓言读法打量的小说越来越少了，各种“新生代”“新写实”“新印象”的作者，借用明人唐顺之的话说，就是“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文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更有连文也不工的，则更为下下矣。在满目这种“婆子舌头语”的小说天下中，从先生的小说集《雪域精灵》显得沧海横流、鹤立鸡群，也自然孤立冷清，从先生小说中的哲学从而也成为一种“无援的思想”。而这正是从先生小说是艺术品而

非商品的价值之所在。而这样绝尘的小说居然能够在物质时代出版又再版，又表明世有真赏。任何盲目的悲观也是幼稚的。

五年前写《表现“大象”的诗化小说——导读·代跋》时，师妹从丛曾说我对《震颤的灵魂》着墨过少。趁再版之际将这部大于诗化的、从而在“诗化小说”的标题下不宜言说的“长中篇”的意韵补充阐发也算天随人愿，读者则可以与《跋》相互参阅、或可得虚实相生的鉴赏乐趣。

反复阅读增补修订后的《震颤的灵魂》，突然“悟”出，其主人公不是朗杰而是从先生，朗杰是个符号，朗杰的灵魂震颤的意义是从先生对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的体验性的提纯，所以更准确的说主人公也不是从先生，而是人性的强力意志与超越意识的人格演示：这是一部探讨人的存在状态、灵魂震颤逻辑的哲学小说，“主题”则是表彰良知对人的拯救意义。

我在《心学与美学论纲》一文中说：“美是能够唤醒良知的结构”、“美感是对良知呼声的感应”^①。《震颤的灵魂》的结构正是唤醒良知的结构，朗杰从复仇到朝圣转变正是因了这种唤醒。小熊保护了小孩儿所表达的爱意比任何力量都致命的摧毁了朗杰那以复仇为主旨的强力意志，这个以复仇为使命的康巴汉子可以与熊搏斗却不能与这种良知的呼声抗衡。他的朝圣是自我拯救——超越旧的心理结构、

^① 周月亮著《心学与美学论纲》，载《美学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2002年，第262页、第268页。

完成从愚人到智者的转变。朗杰一家在朝圣路上所遇到的扎西老人就是良知呼声的传布者，他“点化”朗杰的歌声则是这种呼声的直接宣示：

愚痴嗔怒的莽撞人，
整天追逐雪豹香獐。
聪明勤劳的智者，
每天追赶新太阳！
每天迎接新太阳！
每天创造新太阳！

当年，扎西给朗杰他们唱“小熊可怜”时，朗杰沉浸在复仇的狂热中，对和解的呼声充耳不闻，如今听到扎西的歌声“朗杰心里既吹喇叭又打小鼓”。一直坚持和解的童心的多吉，则成了这种呼声的接力传人：“多吉思摸着‘聪明勤劳的智者，每天追赶新太阳。’眼含热泪吹响骨笛，音流如吟如诉，像是在风雪中激扬着悠长的向往急切的呼唤……”（下卷第二节）。多吉的这种笛音不仅是贯穿全篇的主旋律，还象征性的传递到了来寻仇决斗而终于和解的金珠的手上。

《震颤的灵魂》是个“套层结构”：罗布江村反抗那森的奴隶主意志、作为猎人生活方式的杀熊是第一层；朗杰复仇杀熊是第二层；朗杰朝圣、那森之子金珠寻仇是第三层；最后人与熊、朗杰与金珠和解本来可以落实智者扎西唱出的“吉祥早来到，世界得安宁”的祝愿了，却又遭遇了败类的骚乱——盲目的强力意志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愚痴嗔怒的莽撞人”需要超越意识的救度——慈祥智慧和平的佛教对于朗杰他们来说是现成而直接的。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藏传佛教的文化意识形态当中，尽管佛教组织当中有个别败类喇嘛，佛教的义理——超越世俗，这超越意识本身对贪、嗔、痴的人群是种超度，当然只是内在的拯救：因信起义，也就是俗话说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寺院里的败类喇嘛本来应该最超越则偏偏骚乱，用石块打中朗杰磕长头磕出来的脑门上的肿包。但朗杰不再陷入以暴抗暴的循环，他虽然迷茫，但并不因个别喇嘛的行为动摇对佛的信仰。心灵净化了，现实问题就单纯了。但现实问题还得现实解决，朗杰还得买车、金珠还得开车、多吉还得上大学……。这个套层结构还有一道暗线：“熊有人性，可人却常要鬼性。”所谓超越其实也是回归，回归自然、回归童心良知。

贯穿小说的基本问题，也是从古典到现代、尤以进入现代为最撩人的基本哲学问题是：

是强力意志好，还是超越意识好？

理论上说没有抽象而绝对的哪个好和不好。要看这意志和意识的内涵、指向与后果，也正因为没有确解而成为哲学问题，凡是有一劳永逸答案的都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真理一旦成了现成的就变成了教条。也因此文学才成为探求灵魂震颤之“逻辑”的强势文体，谁能摸索出“这一个”逻辑（的某一形态），谁就是在进行真正的创作。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具有哲学自觉的小说家反而能够发

现和揭示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存在论大于认识论，感性总是带领着理性前进。中西方的 17、18、19 世纪都是文学带领哲学前进，这还不是个“形象大于思想”的问题，而是一个感性先于理性感应时代新变、直觉比概念更接近生存真相的问题。逻辑的说，文学形象都包孕着思想，这才有了形象+形象=思想、形象+形象大于思想等“现象”。决定文学形象“含金量”最叫劲的还不是想象和形容的能力，而是生命直觉。从艺术地表现生命直觉这一审美特征上看，我说《震颤的灵魂》的主人公不是朗杰而是从先生。

小说中罗布江村接受那森的挑战是强力意志，那森要当一次奴隶主也是强力意志，但那森邪恶而罗布江村正义；罗布江村杀熊现在说是违背动物保护法，但在他的习惯里还没有伦理和法律问题。但朗杰复仇就是将自然法则强拧做伦理问题。朗杰接受了良知的呼唤后，灵魂震颤的“内涵”是忏悔与和解、寻找新太阳——这种超越意识是人类永远需要的，在人类为征服自然开始要付出代价的“后现代”的今天则尤为需要了。用哲学大话讲，20 世纪是人的强力意志出尽风头的世纪，人的主体性发展到了狂妄的地步，再加上科学神话，使人性丧失了神性的维度，从而强力变成了暴力，打完一次世界大战还打第二次，犹如罗布江村杀熊之后再来一遍朗杰杀熊，而且他们的逻辑是你有熊崽我有儿子，世代轮回在仇杀之中。唯有忏悔和解才能超越这种轮回，和平才能发展。从先生表达的正是 21 世纪的知识分子之“社会的良知、人类之理性”的反思和和平

的呼声。小说的“尾声”固然是光明的尾巴，却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吉祥祝愿、和平发展的世纪主题。

从先生小说具有明显的超越日常性的意图，每一篇几乎都是下笔就在为人物寻找“唤醒的契机”。这个契机说玄也玄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唤醒人的“不好意思”：《震颤的灵魂》中是熊保护人（白玛）、于是死乞白赖要杀熊的人不好意思了；《卓玛》中的养父也是不好意思了才超越了生理冲动。而这不好意思的“根”就在人人都有的“心”里。诚如《魂》中的圣者所言：“你有一颗发光的心，你的灵魂就是心灵的光芒！”

这种“不好意思”，其实是超越意识的起点。而物质时代这么多社会病盖在于因为人们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了“不好意思”，并因此而放逐了神圣和价值这类“意义”，而成为物欲的牺牲品、欲望的填充物。不知为什么看朗杰为赎罪而开始磕八百里长头，让我想起文德尔班的断言：“神圣作为超越实在，被体验作真善美的规范意识。”^① 从先生之所以顽强的追求真善美也正是心有神圣感之故。超越意识的终极实在就是这个神圣，这个虽超越却存在的“实在”需要人们用信仰来拥有它。朗杰发生“根本转变”就因为从无信仰变得有了信仰。就像章太炎说的“无道德则无革命”一样，可以仿词说无信仰则无灵魂。八百里长头这种极端的祈祷形式的意义就在于表现了信仰已发展到内在化的阶段，已不是祈福咒祸的功利计算而是成为了内心的状

^① 文德尔班著《神圣》，载《序曲》，德文版，1903年，第31页。

态：“人在内心听见神的圣音，通过向神呼唤使己身升华，从而达到生命之自觉。”^① 八百里长头磕完，朗杰才算从罪孽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自由正是心灵的超越感。谁能既有强力意志又有超越的自由意识谁就是一个完整而真正的人了。朗杰不算，他的复仇与朝圣都有几分免强而笨拙，说明他的内心或是盲目或是羸弱的。这是因为他的这个二重组合只是“单行线”的拐弯延长，不是交错拧麻花，所以说，朗杰就是“这一个”朗杰。

说实话，从先生是诗人并不特别擅长讲故事，他擅长的是以美学情调的描写表现感觉。根据我的情调的美学价值高于情节的原则，从先生这种美学情调的描写胜过叙事的意象化的小说（而非故事化的小说），实在是种小说史林中的“另类”。另类未必就伟大，但这才是真正的个性化写作。由个性形成风格是个关乎生死存亡的跳跃。实力不够的个性只能作为个人私语自生自灭。风格化的写作是种挑战也是在弄险。但世之奇美常在险怪。《雪域精灵》风格化的力量来自从先生诗化的语言功力，简括的说，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 (1) 将人物感觉哲学化（尤其是三篇小说主人公处于“觉醒的契机”时）；
- (2) 将叙述描写化（尤其是用景语做情语时，如：“雅鲁藏布江呜咽着卷走老人的呼喊。经幡飞抖寂寥的天光。”〔《魂》〕“冰凉的半个月亮漂浮于冰凉的穹苍。”“冷冻的笑

^① 文德尔班著《神圣》，载《序曲》，德文版，1903年，第350页。

从斜睨的血色眼中雪崩”[《卓玛》]。“昨天的太阳又冷冷地升起”[《震颤的灵魂》])。

这就形成了第(3)也是《雪域精灵》的一个总体的艺术特色：达到了本体象征的境界——写实的同时象征、象征的同时写实。

至于句式的别致、语言的灵动、浓缩叠加意象的手法则满篇皆是无需举例了。

由于是序文不是论文，这三点就不展开了，会心极远的读者朋友不难从小说本身找到印证。希望读者用读诗的眼光、心思来赏析从先生这富有美学情调描写的诗化的小说，而不要用看故事的方式一目十行的追逐下面的故事。因为从先生下每一个字、词、标点，都是费尽心力的。

世上常有先生给学生作序的，少有学生给先生作序的。但先生的错爱我又必须遵命，忝列为序，真是诚惶诚恐，不知所云。

2002年8月于北京

自序

民谚：“少不入川，老不进藏。”进入“花甲”之年的我决然进藏，是深感多年来想干工作多干工作干好工作而不能，心力交瘁。为缓解莫名的烦忧，圆我50年代上大学期间的赴藏梦，毅然决然申请进藏。

我是抱着为淳朴善良的藏胞能痛痛快快地效一点力进藏的，是为心灵上获得大自然的洗礼进藏的。没有什么“体验生活”搞创作的念头。

飞机进入雪域上空，钻出云层，眼前扑面而来的雄浑气象使我陡地产生一种身心解放的轻松感。到了西藏农牧学院，校园周围的山水林莽，房舍经幡，竟使我心头软软，如醉如痴。

怀着一种回归大自然、感受淳朴美的愉悦心境，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公务之中。每天课余时间和青年教师、学生在一起谈天说地；星期天、节假日偕青年教师、学生游览山川，或是拜访藏族教师，或是造访附近从事农牧业的藏族同胞。就在这游览与闲谈之中，那渺无人烟的皑皑雪山、滔滔河水、莽莽丛林的大自然，使我觉得回溯到了旷古洪荒的岁月；那心地善良豪放、淳厚虔诚、热情好客的藏胞，使我体味到了久违了的纯真人性。

这壮美苍茫的大自然，这善良纯真的人性，见之动容，思之动心。但我没有想到付诸笔墨。

一天，一位叫扎西的藏族学生给我谈起了农奴时代昌都地区遗留下来的“仇杀”、贡布地区原始苯教遗留下来的“夺福”等陋习在解放后还时有发生的情景，扎西流泪了，我也为这本性善良而背负因袭的精神重担的藏胞父老兄弟姊妹潸然泪下。又一天，一位叫多吉的藏族记者在给我谈起藏地落后于时代激流的话题时，忧心忡忡，慨叹不已，闪着殷切的目光望着我：“老师，您该写点什么。”后来，我读到几本《西藏文学》，藏族青年作家、诗人的作品中，大多透露着民族的反思和警醒，张扬着超越自我超越西藏的沉思和呼唤。我接触过的藏胞，尤其是上过学的青少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绪——崇尚现代文化，向往现代文明。为此，我写过几首小诗。

在林莽中高歌，在雪山顶长啸，在河流边低吟……久而久之，我感到茫茫雪域，有一种雄浑而稀形的“大象”，是佛光？是灵性？说不明白；有一种洪亮而稀声的“大音”，是天籁？是呼号？弄不清楚。只觉得在这稀形“大象”、稀声“大音”之中，巍巍而茫茫的雪域，漠然窥视着剽悍、善良、勇敢、羞怯、刚毅、忍耐的人们幻化着人生正剧、命运交响曲。

在这莫名的“大象”、“大音”面前，感到要表现这“大象”、“大音”，抒情小诗的形式过于单薄了，惟有交响乐尚能胜任，而我又没有能力将我的某种感悟付之于管弦

与键盘。于是我想写小说，而我又从未写过“要讲故事”的小说。好在我在文艺创作活动上一向是不安分的，不会循规蹈矩，我追求我认定的艺术——我心灵上的“美文学”艺术。这一“思维定势”不知不觉形成了我的“规”，我的“矩”（虽然我也总想超越它）。我的这个“规”，这个“矩”，来源于我读过不多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和艺术论以及我的创作体验。这就是我于1982年构思并向学生宣讲了两年后在1984年写成的诗论——《情感场·情智思维·主体目的性》，它表现了我的文学艺术观。

文学是艺术，是流动情色意绪的语言文字艺术。艺术是创作主体面对对象世界，经由主观的审美情智思维予以灵动地变形化意营造某种情感场而使心灵外化的美的表现性形式。它是源于第一自然（自然界）、第二自然（社会界）而升华了的第三自然——艺术美的心灵世界。它的实质是经由变形化意建构具有主观情色意绪的人性人情的情感场，它的品格是新鲜的“这一个”美的艺术。而创造“这一个”美的艺术的主体——诗人、作家，面对社会人生，当有强烈的人类历史感、使命感和与之相应的忧患意识，力争以哲人、思想家的胸襟和眼光，积极地直面社会人生，感悟社会人生。

我写这几篇小说，就是凭藉我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和我对社会人生的某种感悟，怀着对藏胞深沉诚挚的爱，以写诗的心境用心尖蘸心血勾画我心灵眼中的画面，弹拨我心灵弦上的音。一时，思如潮涌，象不暇接，似有“神助”，

根本没有想到什么“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什么“解构主义”、“象征主义”，我只是不知不觉地表现着我的人生观、美学观、艺术观，凡是我认为能为表现我“这一个”作品增音添色的艺术手法和词语，都自然而然地涌了出来，蹦了出来。就这样写呀写呀，每每犹如“庄周梦蝶”，不知不觉地我竟然也走进人物的情绪，诉说人生哲思，融入逗人风光，呢喃自然况味。那种说不清楚的“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审美愉悦，充盈着创作心境。此时，根本没有考虑我是不是在写小说。是的，创作时我有理智的思考，这“理智的思考”只是悄悄伴随着我的创作过程，那就是我想追求缪斯飞白的空间，追求灵动的情色意绪，追求生命形式的象征意蕴，追求建构某种喧腾“大象”、“大音”闪烁真、善、美的情感场。但是，实现这一追求太难了！我只能说，我曾努力这样追求过。

至于这几篇文字是不是小说，我无意申述。若按小说主要在于“要讲故事”的标准看待它，读者也许会扫兴。几年前，香港的文学杂志《黄河春秋》发表了中篇《震颤的灵魂》；河北文学杂志《长城》发表了《魂》。有读者说，文笔挺美的，看不太懂；有读者说，是在向人类良知对话。不管它是不是小说，能看懂还是看不太懂，倘若能唤起读者对人性真善美的某种感悟，我也就很欣慰了。

河北师范大学周月亮教授在为我这几篇文字写的《表现“大象”的诗化小说——导读·代跋》一文中，提到我于1986年发表在青海文学杂志《现代人》第5期的诗论《情